政治社会

河陇形胜的分层结构与社会空间格局

李智君

［**摘要**］地处边塞的河陇，其社会空间格局，有别于中原内地，但要准确地说出是怎样的边塞拱卫理念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空间布局思想，却并不容易。判读了有关“形胜”的史料后，笔者发现，古人所谓的“形胜”，究其本质乃是对区域政治地理环境的评价。西北边塞拱卫地带的河陇，其地域形胜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分层结构特征。这种分层拱卫的政治地理思想，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边塞军事布局理念，还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边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格局。

［**关键词**］形胜　分层结构　空间格局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7）－04－0024－13

The Layered Structure and Social Inter－space Pattern of He Long's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He Long was a frontier fortress area. Its social inter－space pattern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s but is difficult to discern how the sense of frontier fortress, to surround and protect the central area, influenced the people's thoughts about social inter－space patterns. Research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author has found that so－called concept of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xingsheng) actually was an evaluation of regional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he part of He Long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fortress surrounded and protected the central area and showed outstanding feature in layered structure. That is, such layered surrounding and protecting thought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sense of frontier fortress strategic pattern but also made up the inter－space of frontier fortres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一、形胜：古人对区域政治地理环境的评价

“形胜”一词，出现极早。《荀子·强国》称秦国的形胜是：“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杨倞注：“形，地形。便而物产多，所以为胜。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①又《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形胜之国。”裴骃集解引张晏曰：“秦地带山河，得形势之胜便者。”②

可见，这里的“形胜”是指地之形势便利者。与“形胜”概念常常互用的一个概念是“形便”。《战国策·秦策一》云：

>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③

高诱注：“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坏，故曰形便也。”可见“形便”是指有利的地理形势。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形胜”、“形

［**收稿日期**］2007－5－10
［**作者简介**］李智君（1968－），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厦门 361005

便”的内涵主要是指区域政治地理环境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形胜是对区域政治地理环境的评价。

南宋时，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都有各地形胜的记载，但论其成就，则如顾祖禹所云：“《纪胜》山川稍备，求其攻守利害则已迂。《广记》考核有余，而于形势险夷，则未尽晰也。《胜览》以下，皆偏于词章之学，于民物远犹无当焉。国家著作之材，虽接踵而出，大都取裁于乐史、祝穆之间，求其越而上之者，盖鲜也。”④明清时期，地方志、舆地等书中关于形胜的内容大为增加，其中集大成者莫过于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正如江藩所论：“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⑤但顾祖禹对“形胜”描述的侧重点较以往已发生了变化，即有关区域政治区位评价的内容大为凸显，而关于区域资源禀赋等的评价却渐渐淡出。

周振鹤先生在研究行政区域划界时揭橥了两条重要的原则，即“犬牙相人”和“山川形便”。“政区本来就是为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其划界当然要以对集权统治有利为原则；但在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持封建政权的基础，政区边界的划定也要注意使政区与地理环境相一致。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就出现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⑥这两条对立的原则，在不同层次的政区划界时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别的。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高层政区，⑦由于其地域面积、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等容易被地方执政者所利用，凭借形胜之便，尾大不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小王国，因此随着中央集权的日趋加强，犬牙交错的原则越来越占上风。其目的是为了破坏地方要员赖以割据的地域形胜的完整性。而统县政区和县级政区则无此虑，因此“山川形便”的原则始终是此类行政区域划界的主流。由此可见，对“山川形便”，即形胜的评价，首先决定了国家政治区域的空间布局。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区的划分，常常是以政区的边界为边界的。而行政区对文化区的影响，特别是统县政区对文化区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⑧。

单就河陇之地来说，其形胜理念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人们对边塞地带历史民族关系的熟稔，另一方面，是基于人们边塞战事经验的积累。值得注意的是，边塞形胜的评价和认识，不仅决定着边塞民族关系的应对策略、边塞攻守之际的军事布局，还控制着边塞社会和文化的空间布局和地域格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位于西北边塞的河陇地区来说，边塞经营力度的大小对当地社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带来的移民与屯垦规模的涨落和空间分布，内附游牧民族安置地域的差异等，都成为导致社会地域分野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的思考，本文以史料中人们对河陇地域形胜的评价为依据，探讨河陇在全国形胜格局中的分工，以及河陇形胜的空间结构，旨在揭示区域形胜评价时所依据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空间布局理念，并以例证的方式论述“形胜”理念对其社会空间布局的控制作用。

二、边塞拱卫地带：河陇在全国地域形胜中的分工

政治地理学所研究的空间政治现象分为三个尺度，即（1）国家之间的政治格局与相互关系；（2）国家的政治地理特点；（3）地方的政治格局与关系。作为边塞地带的河陇，既是国家之间的政治等压地带，同时也如同其他区域一样，在国家政治地理分工中承担自己的任务。也就是说边塞地带的形胜兼有国际和国家政治地理的双重角色。一般来说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首善之区的首都，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区位优势评价的参照物或“话语中心”。地方政治格局的研究，也分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以区域高层政区治所为中心的形胜评价。从历史上看，由于边塞地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势力消长，“自来僭窃割据，率由于此”⑨，使得地域中心变动不居，因此河陇地区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政治中心。时至明清，人们论述河陇的形胜，依然以昔日的首都长安所在地关中为中心。其次是以统县政区的政治中心即治所为中心的形胜评价；最低是以县级治所为中心的形胜评价。

评价形胜，地理位置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容。河陇位于我国地势三大阶梯之第二阶梯，沿青藏高原北部和东部边缘的河西地区、河湟谷地及甘南高原是地势一、二阶梯的过渡区域。地势西高东低，境内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渭河和泾河，沿着狭窄的谷地咆哮着向东流去；同时此地又是长江支流嘉陵江的发源地；加之又是民族走廊交汇之区，是游牧民族南下入关和入蜀必经之地。因此相对于中原，无论从自然地理还是政治地理角度来看，河陇都“地处上游”⑩，有高屋建瓴之势。

关于河陇在全国的地位和价值，东汉时就展开了一场讨论。东汉国力已无法与着力经营西北的汉武帝时期相比。永初四年（110），“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立北边”。面对此议，虞诩认为：

> 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馀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⑪

可见，虞诩不仅认识到凉州屏蔽秦陇的作用，而且对关西善于骑射的“习兵壮勇”和“豪雄”多有顾忌。安定王符对凉州的重要性，与上述虞诩的看法颇为接近：“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尔，未始识变之理。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人，则弘农为边；弘农内人，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⑫

当然上述的评价是建立在定都关中这一基础上。当首都迁出关中，河陇的边塞拱卫作用就有了新的变化，如王士性所言：“前代都关中，则边备在萧关、玉门急，而渔阳、辽佐为缓。本朝都燕，则边备在蓟门、宣府急，而甘、固、庄、凉为缓。”⑬

至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所系也，可不畏哉！”⑭顾氏所言之陕西，是包括河陇在内的。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的《甘肃通志》评价则是：

> 惟兹甘肃，远处西偏，邠邑郃乡，旧是公刘之国，流沙弱水，昔传禹贡之区，金城为陇右襟喉，连延湟鄯。玉门为关西锁钥，控扼羌番。由朔方以致敦煌，长城屹峙于北，自岷山以至积石，大河横贯其中，祁连青海，天设险以为屏；疏勒、伊吾，地资生而作辅。自汉武开疆，分置凉州刺史，暨自唐宗辟土，兼统河右，诸军礼乐文明之薮，未逮中州，制防形势之规，独当三面。⑮

由此可见河陇在全国形胜中的地域分工：其一，河陇乃边塞之要地，不仅屏蔽关中，隔绝羌戎，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侵；同时拥有河陇，能防止孤悬塞外的西域失控，也能控制形胜优越的川蜀割据。其二，河陇据天下之上游，高屋建瓴，制天下之命者也，所以一旦河陇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加之自来僭窃割据，率由于此。国家大一统规模，不能无思预防之策。

三、层层设防：河陇地域形胜的分层结构

形胜的评价是分不同级别的。通过对传世方志中历史形胜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县级形胜的评价，是以县级政区的治所为评价的中心，然后对其四周远近不同的地貌、水系、交通和军事防御工事等方面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统县政区形胜的评价，是以区域中心城市

为核心，依托较为完整的地理单元，或以流域，或以地貌单元，整合各县级形胜区域，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形胜核心区，在河陇地区就有河西走廊、兰州盆地、宁夏平原、河湟谷地、陇西渭河流域、陇东泾河流域等核心区。不同的核心区在防御时相互配合，形成作用不同的拱卫地带。拱卫地带又围绕着国家级拱卫中心，由内向外，各有分工，在空间上依次展开，呈现出同心圆状的圈层结构，即地域形胜的分层结构。

河陇地区围绕着关中盆地，由内向外，圈层状拱卫地带是（参见图1）：以徽县、天水、平凉、固原、庆阳等城镇为形胜核心的第一圈层；以临夏、临洮、兰州、靖远、中卫、灵武、银川、盐池为形胜核心的第二圈层；以河湟谷地中的西宁和河西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为形胜核心的第三圈层；第四个圈层在中原王朝力能所及时便延伸至西域，限于体例，本文恕不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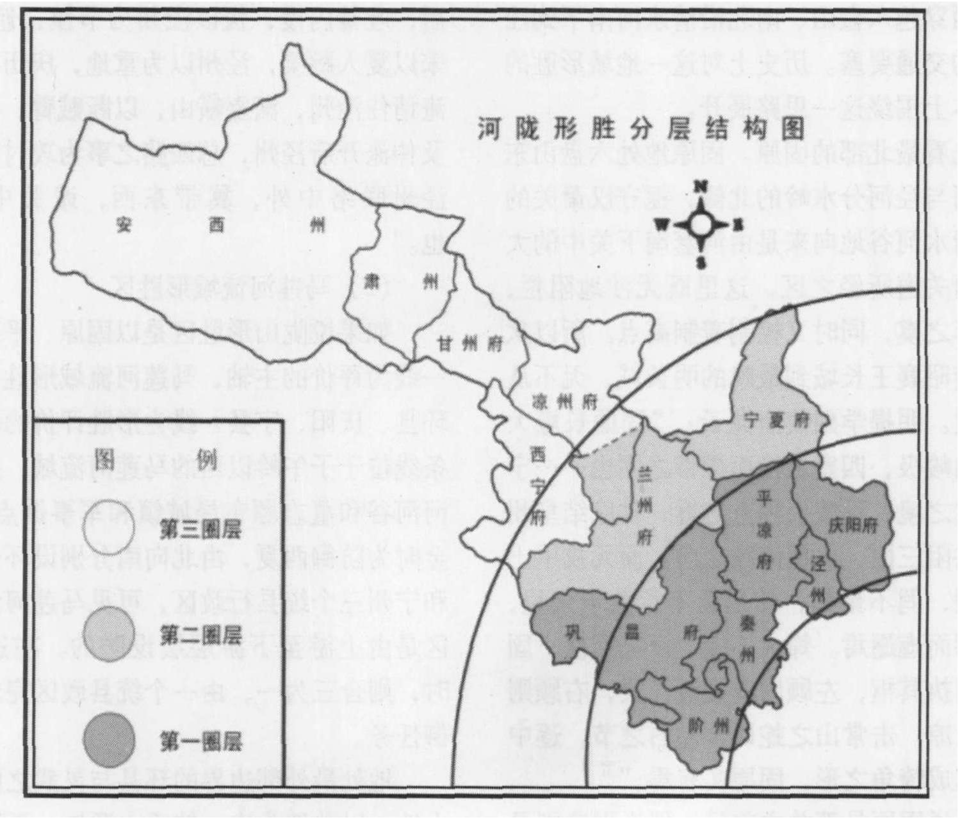

图1　河陇形胜分层结构图

1. 河陇地域形胜分层结构的第一圈层

从宏观上来看，这一圈层是陇关、萧关与秦昭襄王长城之间的地带。从清代行政区划来看，这一圈层分别由庆阳府、泾州、平凉府、秦州、巩昌府和阶州等，共同形成一个以关中为中心的弧状地带。这一圈层的内弧和外弧之间约200公里。虽然他们分处陇山的东西两侧，但内弧都处于黄土高原与关中盆地的过渡地带。界域关中的四关之一的北部萧关，便在这一圈层之内。同时境内的陇关，其军事地位也不在西部大散关之下。就防御的角度而言，历代中原王朝，凭借陇山天险，以两关为要隘，进行地域防御布局。外部则以秦昭襄王长城为界与河、朔相毗邻。这一地带属于黄土高原的陇上部分，以陇山为界，分别属于陇东和陇西。而从形胜的地域结构上来看，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域，分别是陇东的庆阳府，地跨陇山东西的平凉府和泾州，陇西的秦州、巩昌府和阶州。每一部分亦有从内向外层层设防的地域格局。

（1）陇山形胜区

陇山又名六盘山，南北纵列，为渭河与泾河上游的分水岭。“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汧、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16]。陇上黄土高原以六盘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一地带早在《诗经》时代便已经是华戎争

夺的要地。张衡《西京赋》亦云："陇坻之隘，隔阂华戎"。游牧民族一旦进入萧关，关中就无险可守。所以陇山一线的防御从理论上讲是不能被突破的。在以长安为首都的时代，陇山失守就意味着要亡国。在行政区划上，当中原政权拥有河西和宁夏平原时，陇关以北的陇山东、西麓一般被划分为同一个统县政区。反之，则要把同一地域，划分为五至七个统县政区，以便更为细致地进行军事防御。从防御上来看，固原、平凉和泾川三点互为表里，控制着东西穿越六盘山、南北沿清水河南下到泾河流域的交通要塞。历史上对这一地域形胜的评价基本上围绕这一思路展开。

首先看最北部的固原。固原地处六盘山东麓清水河与泾河分水岭的北侧，扼守汉萧关的北部。清水河谷地向来是由河套南下关中的大道——萧关道所经之区，这里既无沙地阻拦，又无水草之虞，同时又控制着制高点。所以从最早的秦昭襄王长城到最晚的明长城，无不从这里通过。明提学副使唐龙云："固原长壕大堑，连山峻极，四塞之接而襟带之固也……宁夏环灵武之境，延绥引朔方之拆，甘凉结皇州之垒，共阻三面，以扼南牧之虏。而元戎甲士利剑劲锻，罔不聚焉，然延袤不啻数千余里，山川纠缪而迤逦焉。烽火不接，声势斯携，固原居中而执其枢，左顾则赴援绥、灵，右顾则迎应甘、凉。击常山之蛇以合左右之节，逐中野之鹿以成犄角之形，固原实有焉。"[17]

如果说固原是萧关之前门，那么平凉则是萧关之后门，故有"陇口之要在平凉，而平凉之要尤在原州"之论。平凉处于北通灵武、西通兰州的交叉路口，"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18]。唐与吐蕃对峙时期，平凉为前沿阵地，"地当御戎之冲要"[19]，"扼弹筝峡口"[20]，其军事地位尤为突出。

由平凉沿泾河向东南，便是河陇拱卫区域的最内部据点——泾川。严格地说，如果北部的固原、平凉、镇原失手，泾川几乎无险可守。但其重要性却并不亚于前三者。泾川是陇东交通的枢纽，古老的回中道就是从这里通向固原，同时从这里进入马莲河流域可达灵武，所以泾川一旦失守，不仅意味着固原、平凉、镇原防线的瓦解，也意味着灵州、环县、庆阳一线失守。故《大清一统志》称泾川的形胜是："群山环翠，泾汭合流，盘礴雄远，邠宁之藩蔽。"而乾隆《甘肃通志》分析说："岭北有事，州实为孔道，晋大元中，姚苌起于岭北，以安定为根本，其后遂为重镇，梁喜谓'若无安定，戎马必至于郿'是也。赫连勃勃因刘裕灭秦，先据安定，尽取岭北郡县，及裕东还，南下长安，势若建瓴矣，夏人入长安，魏人力与之争，然后关中复定，唐自至德以后，吐蕃内侵，恒以泾州为节镇，遮蔽邠岐。宋以夏人跳梁，泾州以为重地，庆历中，范仲淹请住泾州，渐复横山，以断贼臂，寻命韩琦及仲淹开府泾州，总四路之事为攻讨声援。盖泾州联络中外，翼带东西，诚关中之紧要也。"

（2）马莲河流域形胜区

如果说陇山形胜区是以固原、平凉、泾川一线为评价的主轴，马莲河流域形胜区则是以环县、庆阳、宁县一线为形胜评价的轴心。这条线位于子午岭以西的马莲河流域，并沿马莲河河谷和董志塬布局城镇和军事据点。北宋、金时为防御西夏，由北向南分别设环州、庆州和宁州三个统县行政区，可见马莲河流域形胜区是由上游至下游层层设防的。在边事缓和时，则合三为一，由一个统县政区完成三层防御任务。

地处最外部边界的环县与灵武之间的大片土地，以沙地为主，缺乏水源地，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因此人烟稀少，也很难在这里屯兵戍守。但此地又是河套一带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故环县是门户和锁钥。乾隆《甘肃通志》评价是："县为古极边之地，秦长城在其北一里许……唐杨朝晟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于南境。宋范仲淹置乌仑、肃远、洪德诸寨于北界，盖地处冲要，昔人措置经营不惮详密也。至明始废为县，然其地西北与固原、宁夏唇齿；东北一带则花马池、定边之要路。自灵武而南至庆阳，由固原迤东至延绥，相距各四百余里，其中惟此一县，禁带四方，实银夏之门户，豳宁之锁钥也。"

如果把环县比作护城河，那么庆阳就是外城了，而宁县则属于内城。因此庆阳是三者中

防御的重点，也是防御力量最为集中的据点。《明一统志》称：“城高如山，池深如泉，厚阜列峙，沟涧辐辏，地接羌胡，原灦险阻，山川险固为关辅保障，倚岗为城控制边境。”[21]清人对庆阳形胜的分析评价是：“府南卫关辅，北御羌戎……明自河套有事，花马池尝为重地，寇入灵韦，掠环庆、犯平固，皆以花马池为捷径，故恒以重兵戍守，又西为小盐池，则庆阳至宁夏之要道也，由安化、环县而北，无居民，亦无树木，水草皆绝少，至灵州始有之，中间势荒瘠，屯戍者每患无所资以为固也。此筹边之务比他郡为倍急也。”[22]

而相当于内城的宁县，与泾川相比，尚有险可守，故康熙《宁州志》称：“山川高深险固，易守而难攻，为关辅之保障。”而《大清一通志》云：“联络关陇、襟带邠岐，川谷高深，地形险固，岭北有事，州每当其冲。秦并义渠，渐启榆中之塞，唐保豳宁，卒挫吐蕃之锋，志称易守难攻，信矣!”

（3）渭河、嘉陵江流域形胜区

该形胜区位于洮河以东，陇山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流域，秦岭以南的嘉陵江上游地区。横跨秦岭南北的这一地区，其形胜不仅体现在扼守陇关，还在于其是巴蜀的门户。从历史上统县政区的演变来看，秦岭以北统县政区相对比较稳定，基本上保持了二至三个统县政区的规模。变化大的是秦岭南麓的嘉陵江上游地带，一般都保持两个统县政区，但在隋唐与吐蕃对峙时期、南宋与金对峙时期，都被割裂为五个统县政区。可见秦岭以南统县政区始终随着边塞战事的缓急而演变，巴蜀门户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渭河、嘉陵江流域形胜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天水乃陇口之要；其二，是渭河、洮河、白龙江、祖厉河上游之陇西，乃四水源头，四方联络极为便当。其三，陇南乃巴蜀门户。

地处渭河上游的天水，扼守陇口，为丝路要冲，是关中盆地的西大门。顺治《秦州志》的评价是：“西倚天门，东扼陇坻，南连嶓塚，北接凤凰，为兰河中坚，关陇重镇。”民国《天水县志·序》称：“天水……扼陇坻之险，临清渭之渊，东走宝凤，绾毂关中；南下昭广，屏藩巴蜀；西入甘凉，原野千里；北倚六盘，遥控洪流。所谓踵秦旧迹，表里山河，天地之奥区也。”

而介于黄河防御线以内、天水和陇南以西的巩昌府（大致相当于今定西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黄河清渭前带，后护环轩谷，羲台左遮右拱，远眺岷嶓，秀启西倾”[23]，控制着渭河与洮河、祖厉河之间的分水岭，也是黄河上游水系与中游水系的分水岭。从地貌上看，南北向是秦岭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东西向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所以其形胜如康熙《巩昌府志》所称：“江分番境，阶文洮固为之藩，河限边防，安会兰靖张其掖，云栈扼三巴之喉，金城拊五凉之背。”虽然说会宁—陇西—岷县一线距离关陇喉舌、巴蜀门户远了一点，但却与青藏高原东坡接壤，距河湟谷地较近，处于制高点。所以顾祖禹的分析评价是：“府翼蔽秦、陇，控扼羌、戎。后汉初隗嚣据陇西，动摇三辅。诸葛武侯伐魏，欲先取陇右，接连羌夷以图关中。魏亦以为重镇。邓艾尝云：‘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盖其地山谷纠纷，川原回绕。其俗尚气力、修战备、好田猎、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国也。诚于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战。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成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会而河湟之要领举。巩昌非无事之地矣……夫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固陇右，巩昌岂非都会之所哉!”[24]所以巩昌府本质上是渭河与嘉陵江上游形胜区的一部分，与马莲河形胜区的环县作用相埒。

横亘在今甘、陕、川之间的秦岭，山势高峻、绵延不断。发源于秦岭的嘉陵江，奔腾而下，切穿山体，成为河陇与汉中、巴蜀之间联系的谷道。如在汉代就有陇南古道、羌氐道、阴平栈道和天井山道，其中陇南古道是著名的嘉陵道的一部分。因此位于秦岭南麓、扼守嘉陵江河谷的陇南地区，就成为甘、陕、川之间的门户，历史上不仅是陇、蜀之间的茶马运输通道，也是重要的运粮通道。秦、陇得之足以控制巴蜀，巴蜀得之便可取道关中，以成霸业。“州接壤羌、戎，道通陇蜀，山川险阻，自古为用武之地。后汉虞诩为武都太守，占相地势，筑营垒百八十所，以制羌裔。诸葛武侯

图兼关、陇，先取武都，为北伐之道。晋之衰也，仇池氏杨氏窃据武都，北侵陇西、天水，南扰汉中，纵横且百余年。盖虽僻在西陲，而控扼襟要，用之得其道，未始不可以有为也”[25]。以嘉陵江及其一级支流白龙江、西汉水，二级支流白水江河谷所形成的陇蜀通道，以及布局在河谷中的城镇构成其地域形胜的空间格局，如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徽县，“接壤秦陇，本汉武都郡，河池故道。而县地西控天水，南连汉中，称为要害。陇蜀有事，河池在所必争”[26]，位于西汉水上游的西和“内则屏翰蜀门，北并洮、叠，秦城起于州界”[27]。又如控制白龙江及其支流白水江的文县，乃阴平栈道中的重镇，《太平寰宇记》云：“阴平郡为秦蜀出入之处，凿山开往，攀木缘崖，诸葛亮以为全蜀之防。”《方舆胜览》评价文州的形胜为：“东接汉中，南望剑岭，西北出入之地。唐吐蕃域，居万山中，左山右河，苍崖绝壁，为蜀门户。”

2. 河陇地域形胜分层结构的第二圈层

从宏观上来看，河陇地域分层结构的第二圈层从西南向东北，由临夏—临洮—兰州—永登—靖远—中卫—灵武—银川—平罗—盐池一线组成，黄河从其中部流过。从清代的行政区划上来看，该圈层分别由宁夏府、兰州府以及凉州府乌鞘岭以南的庄浪厅组成。其地域范围相当于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兰州市、白银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南地区、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其内弧——秦昭襄王长城与外弧——汉、明长城之间的距离约100公里。这一圈层的形胜评价主要是拱卫陇上。军事防守的主旨是以黄河为险要之地，沿河布局城镇。其最早可追溯到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人进攻匈奴，略取河南地，即黄河上游今宁夏、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的部分。三十三年使蒙恬“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28]这一以河为险，“城河上为塞”的布局思想为历代所继承，且重要城镇都布局于黄河右岸，依次排列。左岸以贺兰山、乌鞘岭以及汉、明长城为依托，形成外围遮蔽工事。左右两岸互为表里。沿黄河顺流而下，分别以兰州盆地和宁夏平原为防御中心，东西遥相呼应。因第二圈层位于朔方，以河为险，故称其为河朔形胜区。从地貌上来看，该区恰好处于三大高原的交界线上，临洮、临夏和兰州三个城镇共同防御着河湟谷地游牧民族的东向发展，兰州又协同永登、靖远、景泰等扼守河西走廊的东大门——乌鞘岭以及游牧民族沿贺兰山后南下的通道。而从中卫、平罗、灵武至盐池一线主要防御从贺兰山口、阴山、鄂尔多斯高原南下的游牧民族。

从历史行政区划的变迁来看，大多数时间里，河朔形胜区都保持着4－5个统县政区，并且在秦汉时期，其统县政区的重心（即治所）分布在陇上，塞上只是陇上政区向外的延伸部分。随着黄河沿岸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其统县政区日渐独立，而且因其防御任务重，幅员也比周边统县政区小。

黄土高原以北，贺兰山以东，鄂尔多斯高原以西的宁夏河套地区，早在唐代，郭子仪就称“朔方，国之北门”[29]，魏焕《皇明九边考》卷八《宁夏镇》亦云：“今三边既为中国所有而宁夏居中，适当喉襟之地。”但其东边、北边和西边分别是荒漠草原地带，向来都是少数民族驻牧之地，使宁夏平原很容易被游牧民族侵占，成为其南下中原的通道和水草补给区，所以说宁夏“背山面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窃之足以抗中国”[30]。一般来说，边塞战事愈是紧要的地域，其统县政区必然是数量多，幅员小，便于提高区域内部的管理精度。然而，历史上宁夏河套地区在全国统一时期基本上保持了一个统县政区的地方行政建置，只有在少数民族如西夏控制时才把政区划小。其中原因恐怕与宁夏有“背山面河，四塞险固”的防御优势可凭借有关。乾隆《甘肃通志》分析明代宁夏战守得失与形胜时说：

> 明初改建宁夏卫，亦以为重镇，即有寇抄，不过河西一带。自正统以后，驻牧套内而患乃更在河东，其祸切而备急者，则尤在花马池。必花马池之备密，而宁夏之肩背始可稍息。何也？河西所当备者，若洪广，若玉泉，若广武，若中卫，虽皆为窥伺之所而犹山溪隔碍，有险可凭；花

马池则川原平旷，北骑驰突，于此最易。由花马池而西，则兴武营。兴武营而北，则为灵州。灵州居宁夏之中，迫近大河，其南与固原边相接。灵州者，实南北之喉舌，而花马池则灵州之门户也。备可一日缓乎哉？若夫贺兰山盘峙宁夏西套，寇阑入河东，往往取道于此。而徐斌水在宁夏西南，又为固原西路之险，河冻则守旧边，春融则守新边，此前人之成算也。夫恃河为险，实非远猷。明万历中，尝得松山之地，说者谓自索桥而上直接镇番，增筑保障，广布耕屯，则贺兰以西皆为内境，而黄河之险，敌不敢与我共，将庄、凉、兰、靖以迄固原之间，皆可安枕而卧矣。

由此不难看出，宁夏河套的防御，凭借贺兰山、黄河和明长城，形成一个由平罗、银川、灵武、青铜峡、中宁、中卫和盐池组成的“人”字形防御格局。其中灵武恰好处于“人中”地带，既控制着黄河灵武渡口，也控制着清水河与马莲河河谷通道。宋之前的统县政区治所都设置在这里，宋之后，银川可以看作是灵武这一功能的继任者。在这个“人”字形防御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就在灵武至盐池之间。这里背靠鄂尔多斯高原，“地形雄坦，天险不周”[31]，所以明代沿鄂尔多斯高原边缘修筑边墙，以弥补形胜之不足，正如主持边墙修筑工程的王琼上书所云：“兹地虏数繇以入，在昔任总制者，率驻固原，惟伏兵内地以待。及创建城堡，添兵增戍，势益分，供输益困。虏每大举深入，因兵散不能御，辄获利出。臣今既扬兵塞上，慑其心矣。请自定边大山口，抵宁夏黄河，咸濬为深堑，堑内筑堤，守以步足，而虏骑不得长驱，则临、巩、平、凤民安枕席，戍兵劳费以渐可损。”[32]黄河一线，虽然“城河上为塞”进行防御，但并不是没有漏洞。《九边图说·宁夏镇图说》云：“自虏人套以来，边患始剧，其在夏秋则用浑脱浮渡，以扰我边，严寒之时，则踏冰卒人，乘我不备，甚至取道贺兰山后，往来庄、凉，恬无忌惮。”不仅要沿河布防，冬季还要在外围地带烧掉干枯的草场，形成一个隔离带。贺兰山一线，有“山口一十二处，宽狭不等，共量长一十五里，旧每口有关墙三道”[33]，依托山势进行防御布局。沿“人”字形的东西两翼南下，分别是庆阳和固原，从中卫西去可达兰州和武威。因此宁夏可谓“夷夏中分此地雄，河山千里镇西东”。[34]

由宁夏沿黄河向西南，至为关键的防御中心便是兰州。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兰州是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会点。从交通上来看，兰州是丝绸古道与黄河皮筏、木筏等水运通道的交会点。“枢机陇陕，控制新疆，南北路万余里。额设重兵弹压，故甘肃兵视天下为最多，而兰州又为最精”[35]。从兰州城自身来看，则金城汤池，“地势平夷，有长城之险，皋兰峙其南，黄河经其北，界接羌戎，其山峻耸”[36]，有险可守。《读史方舆纪要》云：“州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岂非以介戎、夏之间，河西、陇右安危之机常系金城为消息哉？晋元康而降，河陇多事，金城左右，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隋唐盛时，驰逐河湟，未尝不以兰州为关要。及广德以后，兰州没吐蕃，而西凉不复为王土……明时自州以北常为寇冲，往往设重兵驻此，保障西陲。州诚自古捍卫之地矣。”[37]

在兰州和中卫之间的靖远，是丝绸之路穿越黄河的重要渡口——鹯阴口所在地。祖厉河在这里汇入黄河，“西襟甘凉，南引陇岷，北控朔漠，东接宁固，密迩遐荒，颇号岩邑”。仅凭黄河与长城为险，防守压力非常大。一旦冬季黄河结冰，则无险可守。故乾隆《甘肃通志》云：“北面滨河，遇冬冻合，一望平地千里，寇若从贺兰山后，蹈冰驰踔，势如风雨，未易御也。沿河置戍，固不可缓。而徐斌水以西，旧边一带，冬防可倚，不若山后之间道，出我不意，猝难应敌耳。县西百里有乌兰津，尝跨河为桥，以通往来，曰乌兰桥。桥绝则寇不能渡。唐时吐蕃入寇，每欲作此桥，朔方辄潜遣人投其材于河。元和八年，帅臣受贿不禁，遂并力成桥，而朔方无宁宇矣。故山后惟虞冻合，而河津之防则一日不可少疎也。”

在兰州的西南溯河而上，便是扼守大夏河的临夏、扼守洮河的临洮和扼守黄河峡谷的永靖组成的三角形地带，形成了兰州的右翼形胜

区。这一形胜区恰好处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海拔20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其东南为洮河与渭河的分水岭鸟鼠山，西部为积石山，西南为洮河上游的甘南高原，北部为黄河，处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民族走廊和河湟谷地丝路的交汇点，是黄河古渡口——临津渡口和凤林渡口所在地，又是陇右的制高点，是南下巴蜀、西上河湟、北通西域的交通枢纽，“西控番戎，东蔽湟陇，险阻之地”[38]。此区明代属临洮府辖地，土田膏腴，引渠灌溉，为利甚溥，其民皆番汉杂处，好勇喜猎。所以明将徐达称：“临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备战斗，物产足佐军储。”[39]与临洮地位相埒的是河州，今甘肃临夏，“州控扼番戎，山川盘郁，自昔西陲多衅，枹罕尝为战地，盖犄角河西，肘腋陇右，州亦中外之要防矣”[40]。

3. 河陇地域形胜分层结构的第三圈层

介于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北倚长边，南邻山谷，中通一线”[41]。东起乌鞘岭西北，西至玉门关附近的河西走廊，与冷龙岭、大通河——日月山——积石山包围着的河湟谷地，共同组成了河陇形胜地域结构的第三圈层。清代的行政区划包括西宁府、凉州府、甘州府、肃州和安西州。相对于蒙古高原的荒漠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原，河西冰雪融水滋润着的四大绿洲草场、河湟谷地的温暖牧场，以及草肥水美的祁连山峪地带，无疑对游牧民族有更大的诱惑力。一旦两大高原民族之间的联络畅通，陇右则岌岌可危。所以要切断二者之间的联系，护佑河陇，就务必占据河西、河湟的水草之地。而河湟谷地与河西则唇齿相依。河湟相当于河西的东南遮蔽门户。沟通河湟谷地的青塘道则在走廊西部把河西、安西和河湟绾接在一起。故《旧唐书·吐蕃传》云：“夫（安西）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慑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

从自然条件上来看，河西走廊斜卧于祁连山以北，北山以南，是块自东向西、由南而北倾斜的狭长地带。其长约千余公里，宽由几公里到百余公里不等。这里地势平坦，光热充足，祁连山冰雪融水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戈壁灌溉绿洲。在绿洲周边又有条件优越的山地牧场以及祁连山纵谷之中的水草之地。因河西走廊“东界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据居延，悬隔数千里，通西域界羌狄，张全秦之臂掖”[42]，四塞险固，“天下多事，群雄恒睥睨于此”[43]。故窦融尝谓：“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44]作为河陇拱卫体系的前冲，其地位是：“且夫天下之大势在关陕，关陕之保障在河西。河西有善治则保障固而关陕安。”[45]

河西形胜区由四个防御区域东西横列形成一个设防层次结构。河西四个区域的行政区域都是以河西绿洲盆地为中心，沿自然分界线划分边界，并且南北设防。其中北部以长城沿线为防御重点，南部以祁连山谷口为防御重点，而水源既是命根，自然是防御重点，所以每一个郡一级政区的设置都尽可能地把整个水系都包围在域内，并把军事力量以环带状布局在绿洲周围，保卫农业用地，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由于河西四郡在设置之初就以防御为主要目的，所以历史上统县级政区在全国统一时期变化不大，变化主要发生在僭窃割据时期。四个形胜亚区分别是：

武威盆地形胜亚区：以武威为防御的核心，以石羊河灌溉绿洲为腹地。从地理位置与周边的联系来看，凉州“东控宁夏，南距黄河，西连番部，北际沙漠，一线岩疆，三边重镇”。内部的形胜结构是“天梯亘前，沙河绕后，左有古浪之险，右倚西山之固”[46]，“枕天山而瞰沙漠，跨鸾鸟而带伊吾。一线岩疆三边重镇。”[47]

张掖、酒泉盆地形胜亚区：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形胜地位，甘州无疑是河西的核心地带，“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48]该形胜区张掖与酒泉互为犄角。东西向的河西走廊中部有一条连接南北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从南向北的路线是，由河湟谷地的西宁出发，经大通县翻越大阪山，由冷龙岭中部的大斗扁谷之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然后沿黑河北上到居延海。这条道路向来是连接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要道。所谓隔绝羌戎重点就是阻断这条道路。所以张掖和酒泉分别在黑河与白河岸边，把完整的一个张掖、酒泉盆地分为东西两个形胜区域，就是戍守这个“十字路口”。因此其

形胜是“东界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据居延”[49]。

敦煌盆地形胜亚区：以敦煌、安西为防御中心，以疏勒河、党河灌溉绿洲为腹地。敦煌为河西之门户，隋裴矩《西域图志》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地中海），凡为三道，北道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鄯善，总凑敦煌。”所以其形胜是“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支一都会也。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50]。

河湟谷地形胜亚区：“万山环抱，三峡重围，红崖峙左，青海潴右”[51]的河湟谷地，属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边缘地带。北起大坂山，南以黄南山地北缘为界，西起日月山，东到积石山。因其地势较低，气温高，农牧业较为发达。黄土广布，与黄土高原颇多相似之处，是青藏高原北部最温暖较湿润的草场和种植业区域。西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远多寇，议欲弃之”，时任陇、西太守的马援上书称：“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52]宋代，河湟谷地成为西夏与宋、金争夺的战略要地。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熟悉边事的王韶上《平戎策》云：“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向南，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孙，唯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尽在吾股掌中矣。”[53]不仅中原农耕民族，游牧民族也熟谙此中道理。如明代游牧于青海的火落赤云：“留一部于海西，以为牵制，潜渡精兵，直捣洮、河，破其临、巩，则五郡皆囊中之物。”[54]可见，河湟谷地不仅是拱卫陇右的战略要地，而且是控制河西、远至西域的军事重地。这样的军事重地，为何“历代以来，屡收屡弃……其中隶中国之版宇者，十曾不得二三焉”[55]。松门杨氏云：“盖兹郡一线东通，三面外暴，如以孤緪悬弹丸，掷之羌戎掌中。而又设有市口，诸货辐辏，不特五方杂厝，有不远万里而至者。城中牝牡骊黄，冬日伏枥，常以数千计。乃堂皇篱落，自为中外。”可见主要还在于其当四面之冲，无一郡为近援，番汉杂处。相对于蒙古高原西部的荒漠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原，河湟谷地无疑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温暖草场，而河谷地带又宜农宜牧，所以向来都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其形胜是：“其隘则水抱西北，其险则山阻东南。北依山以作镇，南跨河而为疆，地接青海、西域之冲，治介三军万马之会，金城屏障，玉塞咽喉。”[56]

河湟谷地的形胜结构，主要由海拔两千米以下的湟水谷地和黄河谷地两部分组成。其中河湟谷地是以北川河、西川河和南川河交汇处的西宁为中心，倚靠达坂山、日月山和拉脊山，形成湟水上游形胜区。其中大通县是“大河绕其外，高山界于中，联络甘、凉，隔阂羌、狄”[57]，扼守着北川河谷地，镇守着西北通向张掖的交通要道。扼守西川河谷的是湟源县，其形胜是：“路通西藏，逼近青海。山川扼塞，控制羌番。诚边陲之重地，为屏蔽于河湟”[58]。湟中扼守着南川河谷地。西宁以东，碾伯（今乐都）扼守着湟水峡谷，在大通河人湟水处有杏园口渡。其形胜是：“松山后踞，雪岭前临。峰峦环境上，罗立万仞雕墙。湟水抱城流，掩映一条玉带。峡关分布如门，周道中通若线。”[59]

黄河谷地主要由贵德、化隆和循化扼守。贵德县东部及黄南州、泽库地区即两汉时的大、小榆谷[60]。《后汉书·西羌传》云：

> 隃麋相曹凤上言：……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

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牧。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胜兵者，不过数百，逃亡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富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植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

可见在东汉时期，黄河及其支流已成为农、牧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故“背倚黄流，面临青海，河湟夹辅，松潘后屏”[61]的贵德，“亦天所以界番夷也”[62]。循化则是“白石峙于东南，黄河环其西北。前则漓水如带，后则积石为屏。屏障河、兰，牵制鄯、廓，诚西陲之要地也”，控制河西九曲（今隆务河流域[63]），扼守积石关，为黄河谷地右岸的重要据点。另外，化隆（即清代的巴燕戎格抚番厅）处在黄河谷地与湟水谷地之间，北依乐都、民和，以小积石山为分水岭；南滨循化与尖扎，以黄河为界，“雪岭北环，大河南界。锁钥诸邑，弹压群番”[64]，是扼守与联络湟水与黄河谷地的交通枢纽。

四、河陇地域形胜分层结构对社会空间格局的控制

如上所论，地域形胜的评价，是划野分疆的基础。“分疆信地也。自古防边者先分布矣。警备不预，则罅隙可乘；画地不明，则推诿易起。必统领者若元气周流，脉络关节无不贯注，而后荣卫调；分职者若臂指流行，五官四体无不辐辏，而后一身强，此分疆责成意也”[65]。既然边塞形胜存在着要紧缓急之别，那么经营的力度和人力物力的投入就会有多有少，进而影响边塞社会的空间布局。河陇地域形胜的分层结构对其社会的区域布局存在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首先，形胜的分层结构严格地控制着历史上河陇各级行政区划。通过上述的梳理，可以看出河陇高层政区与陕西之间的离合关系，完全受制于边塞形势的变化。有时为了防御的需要，拱卫区的河陇与中心区的陕西就合二为一。有时把边塞要地如宁夏河套划归陕西。在边塞形势较缓和时，一般会以两个独立的高层政区出现。河西和陇右单独作为高层政区在历史上出现过，但为时很短。河陇统县政区的置废，完全受控于形胜结构，当一地成为不同军事力量对峙的前沿阵地时，统县政区数量会增加，幅员会变小，形成一个个组织有序的防御组织。而县级治所的设置，基本上以军事防御要塞为据点。甚至为了防御的需要而大量建城设立治所，而这些城镇的兴衰也是随边塞形势的变化而涨落。

其次，形胜的分层结构控制着河陇军事力量的空间布局。不妨从历代河陇长城的布局变化来探讨河陇军事力量的布局与地域形胜结构之间的关系。长城修建位置的变化意味着军事力量集中地域的变化。战国时，秦昭襄王长城，西起临洮，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西吉、隆德、固原、镇远、环县，经陕西北部抵达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岸上的十二连城。长城是布局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与渭河、泾河、洛河之间的分水岭上。可见抵御胡人南下的兵力主要布局在黄土高原内部。至西汉强大时，一鼓作气把长城地址选择在黄河以北、大漠之南以及河西走廊的北部，因此形成了农牧交错带的最北部界限。随后历代都把边塞防御军事力量集中在长城之南。不仅在长城沿线形成了长城、烽燧等具有鲜明军事特色的地理景观，还因边塞战事频繁，其民居也有显著的军事化特色。如河西走廊至宁夏河套，早在汉晋时广泛分布着军地两用型的民居—坞堡，到后来就发展成为墩堡。明代长城沿线的堡子分布数量和密度都达到空前的程度。墩堡又可分为民间墩堡和沿边墩堡。处于军事对峙前沿的长城沿线主要是军事防御功能更强的沿边墩堡。陇上则以民间墩堡为主。

其三，形胜的分层结构控制着城市防御的规模。边塞地带城池的选址虽然也要考虑交通、水源、腹地供应等等，但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军事因素，“城郭沟池，职在掌固，倚山临水，控扼险要，崇墉深池，以固封守。甘处西陲，城池所关尤重”[66]。按通常的思路，既然城池是为战争服务的，那么越靠近边境，城池应该越加牢固才对，就河陇城池建设的规模和防御水平来看，则恰恰相反。同样是冲要地

带，第一圈层中庆阳、固原、平凉、天水四个明代城市防御的级别最高。如天水城东西横列为五城。据乾隆《甘肃通志》卷七《城池》载：“唐天宝五载，节度使王忠嗣筑雄武城。宋知州罗拯增筑东西二城。明洪武六年千户鲍成约西城旧址筑大城，周四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池深二丈。辟南北二门，东长安，西咸宁。嘉靖十一年又辟南北二门。又大城东为东关城，占古城之半，门二。成化间重修大城之西为中城。东接大城，西距罗玉河，门二。又西为西关城。正德中增筑，高广稍次中城，门四。西为小西关，亦曰伏羲城，以内建太昊宫也，门二。四城皆与大城连属，顺治十一年皆重修。”庆阳府城则是：“城因原阜之势，其形如凤，谓之凤凰城。周七里十三步，东高十三丈，西高十一丈，南北高九丈，引东西二河之水为湟池。门四，东曰安远，西曰平定，南曰永春，北曰德胜，各覆以楼。明成化初，参政朱英修筑并建南门瓮城，城周三里。”[67]固原与平凉的城池也是异常的雄厚。第二圈层的兰州、银川和临洮显然无法与前四者的繁复相比。第三圈层内的河西和河湟谷地的城池顶多与第二圈层持平。出现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因为内部圈层属于城不能被破的最内部防御地带。

其四，地域形胜的层次结构控制着移民被安置的地域。河陇作为边塞多民族地带，中原内地戍边屯垦，游牧民族内侵内附，贯穿于整个历史时期。但移民的安置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别，中原戍边屯垦移民主要被安置在河西走廊和宁夏平原等灌溉绿洲地带。内附的少数民族也大多被安置在这一地域。汉代为安置匈奴而建立的五属国，唐时安置党项族的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都分布于河西、河套地区。至于为什么这样安置，由唐代内附吐谷浑被安置于何处时的争论中能看出一些端倪。

> 圣历三年，拜左豹韬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余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宰相张锡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议徙其人于秦、陇、丰、灵间，令不得畔去。凉州都督郭元振以为：“吐谷浑近秦、陇，则与监牧杂处；置丰、灵，又迩默啜；假在诸华，亦不遽移其性也。前日王孝杰自河源军徙耽尔已句贵置灵州，既其叛，乃入牧坊掠群马，瘢夷州县，是则迁中土无益之成验。往素和贵叛去，于我无损，但失吐谷浑数十部，岂与句贵比邪？今降虏非强服，皆突矢刃，弃吐蕃而来，宜当循其情，为之制也。当甘、肃、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情易安，磔数州则势自分。顺其情，分其势，不扰于人，可谓善夺戎心者也。岁遣镇遏使者与宣超兄弟抚护之，无令相侵夺，生业固矣。有如叛去，无损中国。”诏可。[68]

显然甘、肃、瓜、沙的重要性与秦、陇、丰、灵不在同一个档次。对于中原内地来说，河西和河湟，甚至灵州万不得已尚可放弃，从汉代至北宋始终都有河西、河套弃守之争，便是明证；而陇上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地域。所以内附游牧民族一般都被安置在河西和河套一带。而屯戍移民被安置在这里自然是巩固边防的需要。其次，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陇上，特别是秦昭襄王长城以内的农耕民族在这里居住的时间长，人口密度较大，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可供游牧民族驻牧。

其五，河陇地域形胜的分层结构导致区域文化分野。正是上述移民安置的区域差异，导致河陇区域文化产生地域分异。没有大量屯垦戍边移民迁人的陇上与关中在风俗上保持一致，而四方移民汇集的河西则“习俗颇殊”。至于吐蕃内侵导致河陇语言地理格局的演替，西夏与中原内地的对峙导致河陇近代语言地理的差异等，作者另文详述，此处不赘。

---

①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1《强国》。《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202页。

②《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832－834页。

③《战国策》卷3《秦一·苏秦始将连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8页。

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凡例》，中华书局，2005年，4页。

⑤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 1。商务印书馆，1933 年，14 页。

⑥ 周振鹤：《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230 页。

⑦ 由于历史上各级地方行政区层级变化较大，二级、三级和多级不等，名称也多有变化。为了便于表述，本文采用周振鹤先生界定的概念系统，详见《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载《复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⑧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66 页。

⑨ 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卷 30，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75 页。

⑩ 乾隆《甘肃通志》卷 4《疆域·形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57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⑪《后汉书》卷 58《虞诩传》。中华书局，1964 年，1863 页。

⑫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卷 23《救边》。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 年，108 页。

⑬王士性：《广志绎》卷 1，周振鹤编校，中华书局，2006 年，199 页。

⑭《读史方舆纪要》卷 52《陕西方舆纪要序》，2449 －2451 页。

⑮乾隆《甘肃通志》卷首。

⑯《读史方舆纪要》卷 52《陕西一》，2456 页。

⑰嘉靖《固原州志》卷 2《兵备道题名记》。嘉靖十一年刻本。

⑱㉒㉓㉖㊷㊼㊿㊾乾隆《甘肃通志》卷 4《疆域·附形胜》。

⑲《旧唐书》卷 13《德宗下》，中华书局，1975 年，371 页。

⑳《新唐书》卷 170《刘昌传》，中华书局，1975 年，5174 页。

㉑《明一统志》卷 36《庆阳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72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年，907 页。

㉔㉕㊲《读史方舆纪要》卷 59《陕西八》。2810 - 2811 页；2848 页；2871 页。

㉗《方舆胜览》卷 70《西河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71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年，1060 页。

㉘《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253 页。

㉙《旧唐书》卷 120《郭子仪传》，3464 页。

㉚嘉靖《宁夏新志》卷 1《形胜》。嘉靖十九年刻本。

㉛《王琼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96 页。

㉜《王琼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96－97 页。

㉝［明］兵部：《九边图说·宁夏镇说》。隆庆刻本。

㉞嘉靖《宁夏新志》卷 1《郡名附杨守礼诗》。

㉟道光《皋兰县续志》卷 6《武备》。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㊱《明一统志》卷 36《临洮府》。472 册，900 页。

㊳《明一统志》卷 37《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472 册，933 页。

㊴《明史》卷 125《徐达传》，中华书局，1974 年，3728 页。

㊵《读史方舆纪要》卷 60《陕西九》，2880 页。

㊶张勇《河西防御机宜疏》，乾隆《甘州府志》卷 14《艺文》。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㊸《读史方舆纪要》卷 63《陕西十二》，2971 页。

㊹《后汉书》卷 23《窦融传》，796 页。

㊺宣统《甘肃新通志》卷 40《学校·宋朝南创建书院记》。宣统元年刻本。

㊻《大清一统志》卷 206《凉州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78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年，620 页。

㊽《新唐书》卷 170《陈子昂传》，中华书局，1971 年，第 4073 页。

㊾顺治《甘镇志·地理志》。顺治十四年刻本。

51《明一统志》卷 37《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注引《西宁卫志》，472 册，939 页。

52《后汉书》卷 24《马援传》，第 835 页。

53《宋史》卷 328《王韶》，中华书局，1974 年，10579 页。

54 56 57 61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 3。乾隆十一年刻本。

55顺治《重刊西宁志》卷首《重刊西宁志序》。顺治十四年刻本。

58宣统《甘肃新通志》卷 8。

60 63李文实：《黄河九曲新考》，刊《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51 页；155 页。

62民国《甘肃通志稿·舆地五疆域》。1961 年省立兰州图书馆重抄本。

64宣统《甘肃新通志》卷 3。

65《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19 册《陕西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595 册，605 页。

66 67乾隆《甘肃通志》卷 7《城池》。

68《新唐书》卷 221 上《吐谷浑传》。6227 - 6228 页。